

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当代秘书学三大范式评述

郭 洋

【摘要】范式在学科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体现着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原则和信念,这种原则和信念又规定着学科研究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中国当代秘书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秘书工作说”“秘书活动说”“管理辅助活动说”三大理论,代表了秘书学的三大范式。对这三大范式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分析各自的基本研究原则、价值与不足,有助于目前处于发展低潮期的秘书学研究选择或开创具有持续发展力的主导范式,为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发展动力。

【关键词】秘书学;学科范式;秘书工作说;秘书活动说;管理辅助活动说;批评

纵观中国当代秘书学近40年的发展历程,研究者们就学科研究对象问题发表过诸多见解,其中符合学科研究对象单一性原则并被持续、系统地加以阐述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秘书工作说”“秘书活动说”和“管理辅助活动说”。这三种理论不仅在字面上有所差异,而且实际上代表着秘书学的三种不同范式。本文将深入细致地梳理这三种范式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分析三者的基本研究原则,客观评价各自的价值与不足,以期对陷入低潮的秘书学理论研究起到一定的激发和推动作用,选择或开创具

有主导性和持续发展力的范式。

一、“秘书工作”范式:紧贴秘书实践

(一)“秘书工作”范式的发展过程

1. 萌芽期: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

20世纪80年代初,为适应秘书工作改革和秘书专业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秘书学研究开始在我国兴起,大多数研究者不约而同地以秘书工作为研究对象,以各项秘书工作实务为基本知识单元。王千弓等编著的《秘书学与秘书工作》^[1]、翁世荣等编著的《秘书学概论》^[2]、李欣

作者简介:郭洋,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级秘书与行政助理学。

编著的《秘书工作》^[3]等,典型地体现着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开创了刘翔飞先生所指称的“手册体系时代”。^{[4]①}

2. 形成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

这一时期已有研究者提出“秘书活动说”“秘书现象说”,但大部分研究者仍将秘书工作作为秘书学研究的直接对象进行经验总结或理论阐释。一种是以翁世荣先生主编的《现代秘书学》^[5]为代表。此前的秘书学著作大多对秘书工作进行直观描述,为了矫正这一倾向,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在“史、论、专一体”框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深化了对秘书工作主体的研究,并将各项秘书工作实务归纳为咨询参政、信息处理、内务整理、事务管理四大工作系统^{[5]143-225},力图从理论高度作出规律性总结,从而使秘书学理论与秘书工作实践之间出现一种必要的张力。这可以看作研究者对“秘书工作”范式萌芽期尤其是“手册体系时代”的自觉疏离。

另一种是以李欣等编著的《中国现代秘书工作基础》^[6]为代表。李欣先生反复强调,秘书学研究应紧贴秘书实践。他在《关于现代中国秘书学研究的成就和趋向》^[7]一文中指出,秘书学研究应以秘书工作总体十大构成为基础,深入研究秘书学的共性理论和专项理论,奠定秘书学的理论脉络和框架。秘书工作总体十大构成是指办文(包括公文撰拟、公文校核、文书处理)、办会(包括会务、公务活动)、信息调研、督促检查、公务协调、信访、机要、档案、接待和交办事项;秘书学共性理论包括秘书工作职能(宗旨)、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地位(作用)、特点、规

律、队伍素养、自身管理等八个方面;秘书学专项理论包括沿革(历史)、文书学(含公文撰拟、校核)、秘书工作运转科学(中心是高效率)、办公会科学(含公务活动)、秘书信息科学、秘书调研科学、秘书督促检查科学、秘书协调科学(含秘书公关)、信访科学等。李欣先生还将“从属性”认定为秘书工作的本质特征,并据此总结出秘书工作的基本规律:“如果把领导的要求和需要作为一条线,即‘要求线’或‘需求线’,那么,另一条线就是工作人员为满足领导需要而尽量贴近这条线所构成的‘追逐线’。这是形象化的说法。……秘书工作必须尽一切可能满足、适应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领导工作需求。”^{[6]156②}200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结集出版《李欣文集》,在第六卷《秘书学导论》中,上述有关秘书工作的基本规律被表述为“秘书工作和领导工作是作为服务和被服务而相互依存的一对矛盾,秘书工作以不断改变自身条件来最大限度地适应领导工作不断变化发展的需求,在不断追靠中缩短差距,发展前进”。可以说,李欣先生所提出的秘书学理论体系和秘书工作基本规律标志着“秘书工作”范式的基本形成,在当时影响着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研究思路。

3. 固化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

随着秘书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以李欣先生为代表的“秘书工作”范式逐渐表现出其与秘书工作、秘书专业教育、秘书学学科发展之间的不相适应性。正如“秘书活动说”和“管理辅助活动说”两大理论的倡导者所指出的那样,“秘书工作”范式在分析某些问题时缺乏发展的、辩证

①所谓“手册体系”,是指按照一定工作部门或一定社会职业的实际运作需要,解说其运作程序,并对运作程序中的三大问题进行重点说明:一是运作程序中的关键性操作;二是运作程序中难于理解和掌握的运作方法;三是运作程序中易于出现误差的操作点。同时,也阐述一般性原理和原则。伴随着我国当代秘书学著作问世,并对其产生一定影响的《韦氏秘书手册》,就是采用标准的“手册体系”编写的一本书。参见:刘翔飞.秘书学理论研究的“手册体系时代”及其负面效应[J].当代秘书,2002(8):11.

②李欣先生总结的秘书工作基本规律也被称为“双线规律”,双线是指秘书的追逐线与领导的需求线。参见:常崇宜.简论李欣的秘书理论[J].秘书,2009(1):26.

的观点。例如,秘书必须从属于统治者,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秘书和领导的奋斗目标一致,根本利益一致,只是社会赋予两者以不同层次的责任,表现出主辅关系,如果把这种主辅关系归纳为“从属性”并且用来表达秘书工作的本质特征,显然是不适宜的。

这一时期,研究者主要以评论、教材等形式强化已经形成的“秘书工作”范式,并对秘书学的共性理论作了必要的整合、延伸和拓展,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傅西路先生主编的《秘书学论纲》^[8]、常崇宜先生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秘书学概论自学辅导》^[9]等。

由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抽象,继而进行科学说明和预见,这是所有应用型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这个角度讲,“秘书工作”范式的形成既是研究者主观努力的结果,也符合应用型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之,我国当代秘书学研究是为适应秘书工作改革和秘书专业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而兴起的,“秘书工作”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社会需求,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秘书学研究的发展。

(二)“秘书工作”范式的基本研究原则

“秘书工作”范式的基本研究原则是紧贴秘书实践,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重视以秘书工作经历为依托,习惯于选取更贴近秘书工作现实、更具有针对性的应用课题,研究视

点则随着现实热点的变化而转移。二是习惯使用秘书工作实践中的日常概念和经验性概念,比如秘书、秘书工作、秘书部门、参谋作用、助手作用、办文、办会、办事、职能、政务、事务、日常运转、秘书信息、秘书调研、秘书协调、秘书保密、秘书心理、秘书管理等。三是所阐释的理论中有一部分是政策规定或经验总结,比如“三服务”^①“四个转变”^②“三项重点工作”^③“经常性与突击性相统一”^{[8]165-166}等,又比如有研究者提出,编写秘书学教材应把贯彻党的精神、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理论和规律作为重要内容。^[10]四是始终围绕秘书工作来架构秘书学的学科结构。“秘书工作”范式在其理论发展的萌芽期以各项秘书工作实务为秘书学的基本知识单元,在其理论发展的形成期阐释秘书工作的自身结构并构建秘书学的共性理论和专项理论知识体系,在其理论发展的固化期则主张从秘书工作的综合理论、日常业务、专项业务、高新技能以及秘书工作纵横这五个方面来构建秘书学的学科体系,^[11]这些研究均是由秘书工作结构来推演秘书学理论结构或学科体系。五是反复申明秘书学是一门具有极强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科学,强调研究秘书学的目的是指导秘书队伍做好秘书工作,因此一方面认为秘书学理论主要来源于秘书工作经验,另一方面要求秘书学理论能够直接运用于秘书工作实际,解决秘书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①办公室工作中的“三服务”概念是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党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座谈会上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首次提出的,展开来说就是办公室工作要为领导工作服务,为同级和上下级机关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在这次座谈会之后,“三服务”就成为办公室职能的代名词。

②早期的“四个转变”分别是指:1.由偏重管理事务转向既办好事务又抓好政务;2.由做好日常工作为主转向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基础上,突出重点,为中心工作服务;3.由被动承办转向主动服务;4.由传统式管理转向科学化、现代化管理。参见:程四林.办公室工作要实现“四个转变”[J].中国公务员,1997(2):32-33.

随着理论研究的发展,对“四个转变”的表述更加简洁准确,分别是指:1.由事务性服务向政务性服务转变;2.由被动承担任务向主动思考问题转变;3.由收发传递信息向综合处理信息转变;4.由经验办事向科学化管理转变。参见:郑荣奕.实现四个转变不断提高职业院校办公室工作水平[J].职业技术,2010(6):66.

③三项重点工作是指信息调研工作、督促检查工作、日常工作。参见:刘岁文.努力提高办公室三项重点工作的服务质量[J].秘书工作,1998(7):14-15.

(三)“秘书工作”范式的主要缺陷

1. 对基本概念的研究没有摆脱直观感性经验的取向,学科研究对象看似确定,实际研究范围却界定不清

“秘书工作”范式中大量使用日常概念和经验性概念,这些概念没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是按科学规范加工而成的科学概念,以致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秘书工作”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秘书”“秘书部门”等基本概念含混不清。比如王千弓等在《秘书学与秘书工作》中提出,秘书“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名称之一。其职责是协助领导综合情况,研究政策,密切各方面工作的联系,办理文书、档案、人民来信来访、会务工作以及其他日常行政事务和交办事项。在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从事这一类工作的干部,统称为秘书工作人员,或简称为秘书”。^[12]同年出版的翁世荣等编著的《秘书学概论》、^[2]洪清源等编著的《机关秘书工作概论》,^[12]以及稍后袁维国主编的《秘书学》^[13]等,也都有类似的阐述。上述有关秘书的定义存在一组明显的矛盾:既肯定秘书是一种职务名称,又把并非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纳入秘书的范畴。如此一来,“秘书”在横向上不局限于“秘书局(处、科)”系统,在纵向上不局限于有秘书称谓的工作人员,甚至有研究者把上述定义中“从事这一类工作的干部”具体解释为秘书长、主任、处长、科长、秘书、干事、办事员等。^[14]总之,“秘书工作”范式的学科研究对象看似确定,实际上很不确定。由于研究范围界定不清,其研究成果中存在诸多“形同实异”“形异实同”“形实相悖”的概念,^①反映出该范式对有关问题的思考还局限于不稳定的经验层面。

2. 对秘书系统、领导系统、管理系统的内在联系缺乏实质性认识,对秘书工作难以真正做到规律性把握

对秘书系统与领导系统之间关系的探索,

“秘书工作”范式在其形成期才逐渐涉及。代表人物傅西路先生意识到,秘书工作“是紧紧围绕为领导工作服务这一轴心而进行的”,秘书学必须“以秘书与领导、秘书工作与领导工作的关系为主线,深入系统地研究带规律性的问题”。^{[8]前言²}但是在“秘书工作”范式的理论发展过程中,这一主线并没有被贯彻始终,对规律性问题也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比如,对秘书与领导基本关系的理解和阐述,对秘书工作基本规律的认识和表达,都没有真正从主辅系统要素及其内在联系的分析中把握“需求”与“适应”的确切内涵。此外,“秘书工作”范式各理论发展阶段的代表性成果都没有涉及对秘书系统与管理系统的关系的研究,因而无法经由领导系统和管理系统的联系来认识秘书系统,也就无法准确把握秘书系统的本质特征。

3. 对现代科学理论缺乏必要的了解,既难以与时俱进地采用现代科学眼光来审视秘书工作,也难以严谨地按照现代科学规范来构建秘书学

“秘书工作”范式的理论研究者为构建秘书学学科体系殚精竭虑,但由于对科学的一般结构规律(包括学科分类的依据、原则)和秘书学自身的衍生分布规律缺乏应有的了解,在研究中常常出现与科学规范相悖的现象,比如过分强调理论应直接为实际工作所用,依据秘书工作结构来推演秘书学理论结构或学科体系便是一例。还有研究者把基本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相混淆,或把学科研究领域与学科体系相等同,对子学科的划分与排列也较为主观随意,以致最终未能构建起为科学所认同的秘书学学科体系。

上述缺陷使得“秘书工作”范式始终未走完从“经验总结”到“科学说明和预见”的全过程,其研究成果尚不完全具备一门学科应有的理论形态,难以真正对秘书工作、秘书专业教

①“形同实异”“形异实同”“形实相悖”中的“形”是指语言形式,“实”是指内涵。

育的发展起到系统的理论支撑和引导作用。近年来,“秘书工作”范式的理论研究进展趋缓,也鲜有新的原创性见解,因而其对秘书工作、秘书专业教育、秘书学研究的影响力大为减弱。

二、“秘书活动”范式:强调学科纲领建设

(一)“秘书活动”范式的发展过程

“秘书活动”范式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董继超先生,根据其研究进展,这一范式的生成轨迹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1986—1989):从董继超先生的第一篇论文《试论秘书学科概念体系的研究》^[15]发表到其主编的第一本教材《公务秘书学》^[16]出版

董继超先生借鉴科学认识三阶段论^②提出,秘书学的体系建设“要起始于科学事实……再经由归纳……然后运用科学抽象,变经验知识为科学理论”,^[17]并相继探讨了秘书学的概念体系、体系结构、学科对象、学科逻辑起点、学科性质、学科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强调要重视对这些学科纲领内容的研究。董继超先生在《秘书学的研究对象之我见》^[18]中首次提出“秘书活动说”理论,并阐述了秘书活动的三个要素(即主管人员的主体活动、秘书人员的参谋活动、对客体的管理活动)和“秘书活动说”的五点理论价值(即能够体现学科对象的特征,能够挣脱经验知识的束缚,能够避免研究内容的庞杂,能够提供合理的体系框架,能够适应领导科学的发展)。^[18]^[16]上述研究成果除散见于多篇论文之中,基本集中于《公务秘书学》的绪论部分。^[16]^[42]由此,“秘书活动”

范式初具雏形。

2. 第二阶段(1992—1997):从董继超先生的论文《关于秘书学研究的若干认识问题》^[19]发表到其主编的教材《秘书学教程》^[20]和《普通秘书学参考资料》^[21]相继出版

董继超先生指出:“一门新兴学科的创建,必须把学科纲领作为研究工作的重点入手。所谓学科纲领,就是对该学科起指导作用的理论原则。”^[19]^[11]董先生不仅对“学科纲领”的内容作简要梳理,而且对广义秘书学与狭义秘书学、秘书学理论与秘书学概论研究、秘书学研究与秘书工作研究的关系以及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科研队伍状况问题、研究领域界定问题、秘书学史研究问题等提出见解。1991年,第二届“秘书学与秘书工作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广元召开,他在会上强调:“对秘书界来说,其基本任务就是理论研究,其中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术理论研究。”这里将理论的传统分类标准引入建设中的秘书学学科,有着重要的理论认识意义和实践操作价值。在《秘书学教程》绪论中,董继超先生将秘书活动的“三要素”发展成“四要素”,即秘书人员——秘书活动的本体,秘书工作——秘书活动的对象,秘书环境——秘书活动的空间,秘书方法——秘书活动的媒介;^[20]^[11]对秘书活动的文牍性、机密性、事务性、政治性、受动性、补偿性、潜隐性等七大特征进行剖析;^[20]^[11-12]总结出秘书学的体系结构由绪论、秘书职能、秘书实务、秘书方法、秘书素质五大知识单元构成。^[20]^[13]上述见解使形成中的“秘书活动”范式的影响力不断得到延伸。

①该论文发表于《秘书之友》1986年第2期,署名“董少非”。

②科学认识三阶段论是日本物理学家武谷三男提出的一种物理学方法论,认为人对于自然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描述现象和描述实验结果,称为“现象论阶段”;第二阶段是了解产生现象的实体结构,并根据这种结构的认识对现象的描述进行整理以获得规律性,称为“实体论阶段”;第三阶段是以实体论阶段为媒介深入到对本质的认识,称为“本质论阶段”。

3. 第三阶段(1998—2000):从董继超先生的论文《秘书学问题数说》^[22]发表到其绝笔《秘书学问题新探——关于学科对象问题》^[23]发表

在“科学从问题始,以问题终”^[22]的启迪下,董继超先生对秘书学研究中存在的但尚未解决的20个问题作了整理,以寻求探究秘书学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模式。随着认识和研究的逐步深化,董继超先生把“秘书活动”的概念修改为:秘书人员为主管(之前的定义中“主管”为“领导者”)实施有效决策与管理(之前的定义中“决策与管理”为“领导”)所采取的辅助行为,^{[23]9-10}从而使“领导”的涵义具体化;秘书活动的构成要素也发展为“五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媒介要素、空间要素和依据要素)^{[23]9},表述上趋于准确。上述观点见于董继超先生罹难前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秘书学问题新探——关于学科对象问题》中,在这篇文章中董先生还对“秘书工作说”“秘书现象说”“文秘工作说”“辅助领导活动说”等重新加以审视,略加评说,同时对“秘书活动说”理论的合理性和缺陷进行了反省式梳理。

(二)“秘书活动”范式的基本研究原则

“秘书活动”范式以学科纲领建设为基本研究原则,其研究理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秘书工作”范式有显著的区别。在研究理念上,“秘书活动”范式强调秘书学研究是一种科学认识活动,其直接目的是对秘书、秘书活动及秘书学自身作出科学说明,^{[19]11}追求的是变经验知识为科学说明,即“并非是简单地总结中国秘书活动的经验事实,或只是在总结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概括一些仅有局部指导意义的方法、原则,而是要着眼于揭示秘书活动的全部规律,构建起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定律、原理组成的理论体系”。^[24]在研究内容上,从主要倡导者对学科研究任务的确定、选题取向、研究成果比重等方面可以看出,“秘书活动”范式更侧重于对学科纲领以及秘书活动一般性理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秘书活动”范式一方面注重理论抽象,比如对诸多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行反复界定,对

学科纲领内容和秘书活动性质、特点、要素、职能的概括阐释,对秘书学经验性、理论性问题的理性归纳,以及对“秘书工作”范式研究者视“经验总结”为“规律”的质疑,等等;另一方面注重对现代科学理论及相关学科知识的借鉴,比如卡尔·波普尔、拉契科夫的科学哲学及科学学理论,西蒙、孔茨、彼德·德鲁克等的管理学理论,以及国内学者有关行政学、领导学、思维科学等的理论,而且进一步提出了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即沿用现有的科学概念、移植其他学科的概念、改造流行的普通概念、创造秘书学科的新概念。^{[15]6-7}

上述以学科对象——秘书活动为总论、以秘书活动五要素为分论的研究理念、内容和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初刚露头角,就击中了“秘书工作”范式的“软肋”,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和赞赏,直到21世纪初,仍然为一些研究者(尤其是教学工作者)认同,在秘书专业教育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秘书活动”范式的不足

毫无疑问,“秘书活动”范式所强调的研究理念、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该范式虽反复强调学科纲领建设的重要性,对相关理论始却始终缺乏精准的把握;另外,该范式把秘书学学科研究同秘书活动研究割裂开来,并将其等同于秘书学自身的理论研究,又将秘书工作研究简单定性为经验描述性实务研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由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抽象”这一应用型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该范式的基本研究存在“矫枉过正”的隐患,存在某些不足。

1. 理论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多含混舛误

与秘书工作相比,秘书活动的研究范围要大得多,但是“秘书活动”范式在其构建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涉及秘书活动的分类问题,也没有对秘书活动的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因此留下了很大的理论空缺。在学科理论建构方面,“秘书活动”范式存在一定的误导,主要表现为其理

论体系中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相互混杂,比如“秘书学史”属于基础理论,却被纳入应用理论层面去研究。此外,“秘书活动”范式在其理论发展的前期将“普通秘书学”认定为“理论秘书学”,之后又在其他文章中将其定义为“通用秘书学”,始终没有统一的标准。

2. 有关秘书活动一般性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

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秘书活动”范式更侧重于对学科纲领以及秘书活动一般性理论的研究,但是相对于学科纲领的研究,“秘书活动”范式在一般性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以董继超先生的研究成果为例,仅有《潜隐性——秘书活动的重要特征》^[25]《试论秘书与领导者的关系》^[26]《秘书价值浅识》^[27]三篇论文,董先生在其主编、参编的教材中执笔撰写的内容也主要是“秘书职能”“文书管理”等部分,而相对于“秘书工作”范式的研究,董先生对实际工作问题也缺乏应有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某些知识性概括在认识上有失准确,比如关于秘书活动的潜隐性特征,“秘书活动的潜隐性,是指秘书行为一般包含在领导行为和组织行为之中,有着明显的潜在性和隐蔽性;……秘书活动的潜隐性,规定秘书没有自己的劳动成果”,^[25]因此秘书不能追求自己的劳动成果,成果应该是领导者的。这与现代秘书活动的实际特征不尽相符。

总的来说,“秘书活动”范式的理论研究不仅提出了研究体系的思维方法和途径,而且以实践证实其理论研究的价值。代表人物董继超先生在其主编的《公务秘书学》和《秘书学教程》两部著作中,建立了完整的概念体系,并以基本概念为出发点,构建了秘书学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现了“秘书活动”范式的指导意义。不幸的是,董继超先生在2000年罹难于一场车祸,“秘书活动”范式的相关研究也终止于此。笔者以为,董继超先生对学科范式的结论未必就是最后的定论,但是董先生的探索方向、思维视角、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精神值得我们继续

思考和探索。

三、“管理辅助活动”范式:注重系统联系

(一)“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生成轨迹

1. 知识散点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

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林巍先生。林巍先生在探讨秘书学的研究对象时指出,“秘书学是研究在管理过程中如何利用多种方法,通过多种途径,调动多种因素来有效地进行辅助性管理活动的一门科学,或者说,秘书学是研究如何进行辅助性管理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28]强调秘书学所研究的是特殊的辅助性的管理活动。在《秘书工作概论》^[29]中,林巍先生又专章阐述领导系统与辅助系统,并把辅助系统细分为决策性、执行性、裁决性、辅助性组织,把辅助性组织的工作细分为参谋性工作和后勤性工作。林巍先生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行政学理论,虽然其所说的辅助系统仅指文职官员系统,并且“辅助性组织”和“参谋性工作”的范围远大于“秘书组织”和“秘书工作”,但是这一论述是首次尝试在管理系统的大框架内研究秘书工作,对秘书学的创新研究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在这一阶段出现的比较重要的理论观点,还有赵映诚先生关于“秘书学体系的核心应该是辅助与决策的辩证关系”^[30]的阐述,朱佳林先生关于“秘书与管理”“秘书与领导”^[31]的阐述,赖瑞云先生关于“秘书工作的基本形式是对付管理的信息流”^[32]的阐述,以及此后众多研究者关于秘书角色特征、秘书工作本质特点讨论中所包含的科学成分。当时并没有研究者从管理辅助系统的视角对这些散在的知识加以整合,在1990年《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将秘书学纳入“管理技术与方法”的三级类目“文书工作”之后,这些散在知识才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

2. 理论创建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

钱世荣先生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开路者。

1994年至1995年间,钱先生在《秘书之友》上推出他的第一个秘书学专题研究成果“秘书纵向分层研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专论,认为我国实行的行政等级不能成为秘书纵向分层的科学标准,并从秘书工作者的客观组成状况出发,将秘书在纵向上分为技术操作层、行政执行层和决策助理层。^①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秘书学:研究“辅助领导”活动规律的科学——秘书学在科学学科结构中的定位》^[33]中,钱世荣先生正式提出,秘书学是研究“辅助领导”活动规律的科学,并论证秘书学的直接领属学科是广义管理学。在这一时期,钱世荣先生将秘书系统作为一个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来研究,深入细致地探讨并解答了该系统的结构、功能、主辅系统关系,以及该系统理论的核心、问题、发展等,由此提出,秘书学是研究“管理辅助”活动规律的科学,其直接领属学科是广义管理学;将秘书学的理论核心确定为“管理辅助”,将秘书学学科体系概括为“三层次分布体系”(即技术操作层、行政执行层和决策助理层),将秘书学基本理论体系概括为“学科论”和“活动论”,逐步构建起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理论体系。2008年7月,钱世荣先生的专著《秘书系统: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34]出版,标志着“管理辅助活动”范式正式形成。

(二)“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基本构架

“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由“活动论”和“学科论”两部分构成。

1. 活动论:关于秘书活动的一般理论,亦称“秘书学核心理论”

系统观部分由“秘书纵向分层”“秘书功能”

“秘书行为与领导行为关系”三大课题组成,分析了三种层次秘书共有的辅助属性。在与各种社会系统活动尤其是管理活动的比较中,确认秘书活动的基本特征是“对领导(注意:非领导者)的辅助”,并把这种特殊的社会运动形式表述为“辅助领导活动”。^[33]在与“秘书工作”范式和“秘书活动”范式的代表性人物关于秘书活动基本规律的论争中,将辅助领导活动与领导活动、管理活动加以比较,主张只要予以准确界定,就可以将‘辅助’这种运动形式作为与‘管理’‘领导’等运动形式相对应的新的解释对象。在有关秘书学核心理论的研究中,通过对主从、主副、主谋、主属、主辅系统的横向对比和对辅助领导系统演变过程的纵向分析,界定“辅助”的特定内涵,认为“辅助领导活动”是一种以所属管理系统内的领导活动为直接对象的辅助性管理活动。^[35]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钱世荣先生以“辅助”为“核”(即“中心范畴”),构建起秘书学核心理论(即“活动论”)的基本框架,包括本质论、要素论、规律论、原理论、形式论、内容论、过程论、方法论等8个知识单元。具体地说,本质论——由“辅助领导”活动现象揭示管理辅助活动本质的自然性质和社会性质二重性;要素论——阐释管理辅助活动主客体在特定环境中的联系;规律论——阐释管理辅助活动的基本规律及其特殊体现;原理论——阐释管理辅助活动的四大基本原理及其特殊体现;形式论——阐释管理辅助活动的基本形式;内容论——阐释管理辅助活动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过程论——以信息运动、思维运动、决策运

^①钱世荣先生的“秘书纵向分层研究”系列专论共有6篇文章,分别为:《秘书的纵向分层与秘书功能的有效发挥》(《秘书之友》1994年第12期)、《技术操作层秘书的兴起及影响——秘书纵向分层研究之二》(《秘书之友》1995年第6期)、《行政执行层秘书的第三种流向——秘书纵向分层研究之三》(《秘书之友》1995年第7期)、《处于决策圈边缘的直接辅助层秘书——秘书纵向分层研究之四》(《秘书之友》1995年第8期)、《多能与秘书纵向分层——秘书纵向分层研究之五》(《秘书之友》1995年第9期)、《两种类型秘书的职等差——秘书纵向分层研究之六》(《秘书之友》1995年第10期)。

动中的领导活动为参照,阐释管理辅助活动的基本过程;方法论——阐释管理辅助活动的四大基本方法。^{[34]64-68}

2. 学科论:关于秘书学学科的一般理论,亦称“秘书学自身的科学”

着眼于科学系统和管理学系统,将秘书学作为广义管理学的分支学科来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秘书学的科学学科结构定位(研究“辅助领导”活动规律的科学)、科学形态结构定位(以学科常态衍生分布的科学)、科学演化结构定位(临近常规科学界点的科学)以及这三个层次体系的定位方法,还包括该学科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中心范畴、研究领域、理论结构、学科体系(包括基本理论体系)、学科名称、学科类型、学科归属、学科研究方法、学科研究方向、发展战略与策略等。

(三)“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基本研究原则

“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基本研究原则是在社会活动系统尤其是管理活动系统中研究秘书活动,在科学系统尤其是管理学系统中研究秘书学,并特别注意秘书活动与领导活动、秘书学与领导学的内在联系。由此,“管理辅助活动”范式基本形成了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个层次相对应的研究格局和知识体系:在本体论层次表现为对以“管理辅助”为核心的秘书活动的研究(即“活动论”);在认识论层次表现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将秘书系统作为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将秘书学作为管理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研究(即“学科论”);在方法论层次则表现为上述所说的“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基本研究原则,包括对研究理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基本概括。

(四)“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价值与不足

1. 在理论研究方面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和科学前瞻性

“管理辅助活动”范式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视角、新观点、新理论。一是关于秘书学核心理论研究的创新。钱世荣先生就秘书学核

心理论的“核”(中心范畴——“管理辅助”)与“心”(“管理辅助”的本质内涵)、核心理论的构成、核心理论的科学与应用价值等作了富有见地的阐述,逐步构建起由8个知识单元构成的秘书学核心理论体系,为秘书学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二是关于秘书学科学定位研究的创新。其一,运用恩格斯关于“按运动形式进行科学分类”的思想以及我国科学学研究者所创建的“学科结构立体模型”等理论与方法,提出秘书学是研究“管理辅助”活动规律的科学,其直接领属学科是广义管理学等新观点;其二,将科学三维空间理论和全息理论引入秘书学研究领域,从衍生和分布两个方面探讨秘书学的内外部联系,提出对秘书学按照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应用理论进行构架的“三次分布论”;其三,依据科学演化的一般进程对主要依据详加论证,以此为基础提出我国秘书学“正日益临近由前科学向常规科学转化的界点”^{[24]3}的论断。

2. 基本理论及体系相对完善,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管理辅助活动”范式关于“辅助”本质内涵的阐释、“辅助领导”活动模式的构建、“辅助领导”活动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的整合,能够清晰地揭示“辅助管理”这种特殊运动形式的运动状态及特殊规律。“学科论”与“活动论”在逻辑上相互对称,区别与联系也较为清晰,二者互为依托、互相影响:“学科论”以“活动论”及其应用理论为基础,“活动论”以“学科论”为指导,同时“活动论”的核心内容又是“学科论”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用方面,“秘书的社会类型化”“当代秘书的科技素质”“秘书工作的新内涵”“中国秘书的转型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能较清楚地解释现实秘书工作及其研究中的新问题。尤其关于秘书结构的纵向分层研究,是首次从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入手剖析并勾勒出秘书系统“以领导层为中心、决策助理层为主导、能级递减的三个同心圆结

构”,^[34]由此把秘书划分为决策助理层、行政执行层、技术操作层三个层次,并构建起相应的职系、职级、职等系列,形成“职等差”。这一研究有助于各层次秘书功能的发挥和秘书队伍的建设,也为我国秘书职业资格制度的酝酿和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3. 有关理论观点尚不成熟完善

目前,“管理辅助活动”范式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笔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该范式试图逐渐将“秘书活动”定义为“辅助领导活动”,将“秘书学”发展成为“辅助学”,这样的论点是不完善的。首先,从实际情况来看,辅助领导活动并不限于秘书行为,“辅助学”的说法模糊了秘书活动的主体(秘书人员)和客体(秘书工作),无法概括秘书学的研究范畴。副职对正职、职能部门对领导集团、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等,也同样存在着辅助领导活动,这种辅助活动也是以所属管理系统内的领导活动为直接对象的行为,很明显,这些辅助活动在性质与方式上不同于秘书活动。其次,从概念来看,“辅助领导活动”的内涵窄于“秘书活动”,而“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本义是用“辅助”性质来限制“领导活动”,以表明“辅助领导活动”指的是秘书活动,但在实际效果上还是产生了歧义。

四、结语

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来说,范式和理论体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秘书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经走过了40年历程,前20年是学科基础理论发展的高峰时期,从以李欣为代表的“秘书工作说”,到以董继超为代表的“秘书活动说”,再到以钱世荣为代表的“辅助管理活动说”,这种理论体系研究的迅

速超越与更替,是秘书学发展生命力旺盛的重要特征。然而近十年来,秘书学理论研究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既没有出现对已成系统的三种范式的认同或驳论的热潮,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范式。

一部分研究者意识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纷纷撰文呼吁学界重视理论建设,比如常崇宜的《秘书工作理论的建设问题》(《秘书之友》2004年第1期)、杨剑宇的《合力推进秘书学基础理论研究》(《秘书》2010年第11期)、王守福的《秘书工作理论研究“四问”》(《秘书工作》2019年第6期)。也有研究者试图探索新的理论研究角度,比如余红平的《视角融合:秘书学理论构建新思路》(《秘书之友》2009年第12期)、王上杭的《秘书工作理论研究的实践性分析》(《商业文化》2011年第12期),但是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还有一部分研究者着眼于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资深秘书学者的评价,比如董汉庭的《在秘书学科建设道路上披荆斩棘的人——记湖南商学院刘翔飞教授》(《秘书之友》2007年第5期)、常崇宜的《简论李欣的秘书理论》(《秘书》2009年第1期)等。

目前,秘书学学科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是从新兴学科发展成为成熟学科,还是逐步走向“衰落”,基础理论研究起着关键性作用。笔者认为,首先要对已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细致梳理,将已形成共识的知识体系继续发展,使其成为秘书学理论研究的基石,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根本目的;其次要加强秘书学专业联盟建设,利用高校和期刊的合力效应,对存在争议的问题和尚未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共同推进秘书学理论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千弓,杨江柱,杨光汉.秘书学与秘书工作[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
- [2] 翁世荣,等,编著.秘书学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3] 李欣,编著.秘书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
- [4] 刘翔飞.秘书学理论研究的“手册体系时代”及其负面效应[J].当代秘书,2002(8):10-12.
- [5] 翁世荣,主编.现代秘书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6] 李欣,徐瑞新,李登柱,等,编著.中国现代秘书工作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 [7] 李欣.关于现代中国秘书学研究的成就和趋向[J].秘书之友,1992(7):3-6.
- [8] 傅西路,主编.秘书学论纲[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
- [9]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编.常崇宜,主编.秘书学概论自学辅导[M].北京:线装书局,2001.
- [10] 黄桐华,王立中.关于编写有中国特色秘书学教材的思考[J].南宁职业大学学报,1995(2):11.
- [11] 傅西路.怎样构建秘书学的学科体系[J].秘书工作,1999(9):35.
- [12] 洪清源,吴镛,龚浩.机关秘书工作概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 [13] 袁维国,编著.秘书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 [14] 赵纯贵.《秘书学概论》中基本概念的探讨[C]//屈干臣,选编.秘书学探讨(第二册)(全国高等院校第二次秘书学教学经验交流会 中国高等院校秘书教学研究会第一次年会选辑).中国高等院校秘书教学研究会内部印行.广州:广东业余大学,1986:181.
- [15] 董少非.试论秘书学科概念体系的研究[J].秘书之友,1986(2):5-7.
- [16] 董继超,主编.公务秘书学[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 [17] 董继超.秘书学论文集[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5:98.
- [18] 董继超.秘书学的研究对象之我见[J].秘书之友,1988(3):14-16.
- [19] 董继超.关于秘书学研究的若干认识问题[J].秘书之友,1992(Z1):11-14.
- [20] 董继超,主编.秘书学教程[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
- [21] 董继超,选编.普通秘书学参考资料[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7.
- [22] 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数说[J].秘书,1998(5):12-17.
- [23] 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新探——关于学科对象问题[J].秘书,2000(12):4-10.
- [24] 钱世荣.秘书学:临近常规科学界点的科学——秘书学在科学演化结构中的定位[J].秘书之友,1997(11):3-5.
- [25] 董继超.潜隐性——秘书活动的重要特征[J].秘书之友,1993(12):6-9.
- [26] 董继超.试论秘书与领导者的关系[J].秘书工作,1994(6):15-16.
- [27] 董继超.秘书价值浅识[J].秘书,1998(1):13-16.
- [28] 林巍.试论秘书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C]//屈干臣,选编.秘书学探讨(全国高等院校秘书学教学经验交流会 中国高等院校秘书教学研究会选辑).中国高等院校秘书教学研究会内部印行.广州:广东业余大学,1985:55.
- [29] 林巍,编著.秘书工作概论[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 [30] 赵映诚.秘书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J].秘书之友,1986(3):6-8.
- [31] 朱佳林,编著.管理秘书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
- [32] 赖瑞云,主编.现代秘书学[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2.
- [33] 钱世荣.秘书学:研究“辅助领导”活动规律的科学——秘书学在科学学科结构中的定位[J].秘书之友,1997(9):3-5.
- [34] 钱世荣.秘书系统: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 [35] 钱世荣.秘书学核心理论研究[J].秘书,1999(9):11-17.

A Review of the Three Paradigms of Contemporary Secretarial Studies in China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GUO Yang

[Abstract] Paradig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It reflects the principles and beliefs shared by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hich also define the basic theorie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 discipline research. The three theories of "secretarial work theory", "secretarial activity theory" and "management assistant activity theory" form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ecretarial science represent the three paradigms of secretarial science.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se three paradigms and analyzing their basic research principles, values and shortcomings will help select or create a leading paradigm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wer for secretarial research in the current low development period, and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impetus for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secretarial science; discipline paradigm; secretary work theory; secretary activity theory; management assistant activity theory; criticism